

# 深入剖析秦汉地域文化的切口

## ——《四川汉墓研究》序

霍巍

汉墓是四川考古遗存中最为丰富的种类,不仅数量多,而且墓葬的形制也颇有特点,一方面和中原、南方及北方地区的汉墓具有不少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因体现出不少地方性的特点而引人注目。例如,四川汉代的崖墓,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墓葬制度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对于其起源和发展,都曾引起过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至今还有学者认为它和古代埃及、巴比伦古代文明中的同类墓葬具有可比性,怀疑中国汉代崖墓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又如,四川汉墓中出土的青铜摇钱树及其陶质树座上出现的各种纹饰,尤其是早期佛像和中国传统神话中的西王母图像的交互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四川地区和中原文化的共性,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古代巴蜀文化某些文化因素的长期延续,以及汉通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这个大背景之下,各种外来文化对于地处中国西南边地的“华夏边缘地带”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汉代四川墓葬的研究,如同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最为关键时期的秦汉帝国整体文化研究当中,寻找到一个十分适当的切口,以此作为典型案例,可以从中人深入地剖析秦汉地域文化的源流演变,从而为丰富的层理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

索德浩所著《四川汉墓研究》一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宏大叙事背景,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四川汉代墓葬资料的科学整理与研究,进而从考古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对汉代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为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提供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索德浩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一直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不少汉墓。所以,在他入跟从我读博期间,关于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我和他都认为可以选择四川地区的汉墓作为研究对象。但至于如何寻找研究的具体切口和突破口,却一直让他感到困惑。因为面对这批数量如此之巨、内容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将研究的重点选在哪里更为合适,我心目中的设计方案和他的想法可能并非完全一致。如果面面俱到,则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前人的研究;平均用力也很难突出重点,很难在一篇博士论文中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索德浩很显然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最初他设计的博士论文提纲包括了十个章节,几乎涉及四川汉墓考古的许多重要方面,他还试图以此为起点,对汉墓背后所隐藏的若干历史与社会情形也尽可能地有所触及。最后,我也支持他放手一搏,让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好这篇博士论文。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著作,主体部分和他的博士论文密切相关,甚至连标题也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标题,不过,在此基础上也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拓展。

那么,这部基于博士论文但又不囿于博士论文的

新著,有哪些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向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推荐呢?我提出如下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这是迄今为止公布四川汉代墓葬资料最为全面、最为丰富的一部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由于索德浩自身具备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有着长期的资料积累,又十分注重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所以他所能利用的四川汉墓的考古材料远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在这部著作当中,只要去翻一下书中的附录,附表就会知道,这一座座的汉墓很多都是经他之手发掘出土的,又经过专业而系统的梳理;其他一些汉墓的材料

也一并被他纳入其中。这对于今后希望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研究的考古同仁而言,可以从中“按图索骥”,获益匪浅。

第二,在这部新著中,可以看到索德浩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四川汉墓的类型、年代、分期、分区等基础性工作进行了远超前人的工作,建立了一套四川汉墓的考古年代序列。他的工作方法是非常严谨而细致的,这当中既对墓葬的类型、形制进行了考古学的观察和分析,也对墓葬中出土的器物进行了相应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他尤其注重将有纪年的墓葬材料作为断代的标尺,同时再将没有纪年的墓葬与同类型的墓葬进行比较,“从已知求未知”,尽可能使自己的观察能够将客观与主观两相结合。同样,对于墓葬中出土的各类器物,他首先会选取其中有明显纪年标志的器物(如钱币、铜镜等)作为参照系,再与墓葬形制的演变结合起来,最后提出墓葬发展演变的总体规律和自己的断代、分期依据。这样的工作方法令人不禁联想到当年的名著《洛阳烧沟汉墓》的断代方法。这套方法也被他熟练地利用到了四川汉墓的断代与分期研究当中,其成效十分显著。多年来,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如何科学、有效地利用地层学、类型学的基本方法,而区别于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以及文字很少的“原史时期考古”,这是所谓做“后段”的考古学者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可以说索德浩对此交出了一份极有分量的“答卷”。

第三,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时期考古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解决历史问题这个“原点”上来,这才是中国考古学者的初衷。他在书中写道:“历史考古的特点也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难点是,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增多,文化面貌复杂,增加了历史考古研究的难度;文献丰富,需要研究者拥有坚实的文献功底,但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研究者的文献研读能力远逊于从前,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历史考古的重要原因。而且丰富的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学独立发展,虽然有考古研究者不愿意承认,但是目前历史考古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基本停留在证经补史的层面上,成果多以考古资料与文献作僵硬的比譬为终结,深入研究不多,常常使考古学成为历史

文献的附庸……历史时期考古资料非常丰富,但研究却相对滞后,这与理论、方法的缺乏有很大关系。目前历史考古研究仍以时空编年研究为主,利用的方法还是类型学、地层学等传统方法,这两种方法论在获取资料 and 基础整理、研究时很有作用,但是深入研究明显力不从心,而历史考古的发展趋势已不再是时空编年等基础研究所能满足的,所以历史考古目前最需要的是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解释、研究这些有效信息资料,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

对于他的这些认识,我是深表赞同的。同时,我也很欣慰地看到,在这部新著中,索德浩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取得了不少原创性成果,体现出他不仅具有考古学的坚实基础,而且视野开阔,思维敏锐,能够从驳杂繁复的考古现象中发现历史的线索,提出并尝试解决一些四川古史上的重大问题。

例如,他对于四川汉墓文化因素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考古遗存表面,而认为应当首先是了解、熟悉分析对象或者与之有关的内容,进而以类型学研究为先导,对考古遗存进行分组,最后在此基础上利用以上研究结果分析文化性质、分区、源流、文化关系、演变等内容。他根据自己总结出的这套经验,对四川汉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器物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将四川汉墓文化因素分成八组,通过分析各组文化的演变、消长,认为“汉制”在四川汉墓中形成于西汉中期,与关中地区的步骤基本一致。“汉制”形成之后,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之中。“汉制”在四川汉墓中有三次重要变化:两汉之际出现横穴墓;东汉中期,主要表现在区域文化的兴起,一套具有蜀地特色的器物群出现;蜀汉时期,本地特色器物重新占主导地位。

最后他得出结论:“四川地区文化面貌非常复杂。汉帝国大部分地域都曾文化因素传播到蜀地,有相邻的关中地区、西南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也有稍远的洛阳周边、徐州周边、岭南地区,还有更远的北方草原地区,甚至是东南亚、南亚、西域等域外地区。”我认为,他的这些观察和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与两汉时期四川盆地与周边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的背景相吻合。除此之外,他还从更为深远的层面论述了四川汉墓的演变与两汉时期的国家政策、政权更替、文化教育、经济、移民、气候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多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新见解。

类似上面这样的例证,在书中还有很多,请读者诸君自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为《四川汉墓研究》序,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 《四川汉墓研究》

作者:索德浩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8 月

### 《齐鲁文物》

作者:索德浩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8 月

展”为例)极具创新价值。文章详细介绍了该展览如何打破传统革命主题展览的叙事模式,通过“历史文献研究+考古方法论”的跨界融合,实现了甲午沉舰水下考古成果的“时空对话”。例如,展览将水下考古出土的机舱、罗盘等实物,辅以3D还原沉舰场景、VR体验海战过程等多媒体技术,构建了“实物叙事+情感叙事+科技叙事”的多维结构。这种创新不仅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更提升了革命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鲁元良等人的《馆藏大型文物保护迁移方法探究——以山东博物馆藏明代漕运船保护性迁移实践为例》,则展现了文物保护技术的创新突破。明代漕运船体长21.8米、重约8吨,且材料劣化严重,保护性迁移难度极大。研究团队通过三维激光扫描建立船体数字化模型,创新设计出“分段式弧形托架+龙门架吊装+搬运坦克车协同”的迁移方案,全程实现船体倾斜度控制在0.5度以内,无任何结构性形变。文章公布的技术参数与风险控制模型,为大型脆弱文物的保护迁移提供了技术范式。

### 学术坚守:严谨规范与跨学科思维的双重保障

纵览《齐鲁文物》2025 年第一辑,其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上,更源于对“严谨规范”的坚守与对“跨学科思维”的倡导。每篇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学术审核,展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

同时,刊物积极倡导跨学科研究方法,打破单一学科的研究局限。“石观万象”专题中,杨爱国的论文融合历史学与考古学视角解读画像方砖,姜生的研究结合宗教学与影像学分析道教起源;考古板块中,《试论东汉时期墓园选址与道路的关系》将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相结合,探讨东汉豪强家族的社会观念;文物保护板块中,明代漕运船迁移研究则融合了材料科学、工程学与考古学知识。这种跨学科思维不仅拓展了文物研究的视野,更推动了学术创新。

《齐鲁文物》2025 年第一辑的出版,既是对山东文物研究最新成果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学术刊物创新发展的积极探索。它以“石观万象”专题为核心,深度解码山东石刻的文化价值;以多板块协同为支撑,展现文物研究的多元维度;以形式革新为助力,让学术成果走进更广阔的读者群体。

(作者单位:山东省博物馆学会)

### 《齐鲁文物》2025 年第一辑

编:山东博物馆

出版社: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7 月

《绮彩珐琅》一书是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转制后编著的第一本陶瓷专业书籍。本书臻选 61 件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馆藏文物,通过精心拍摄、详细描述、细致研究,最终成书。这部著作绝非泛泛而谈的艺术图录,而是一套可执于掌中、用于实战的珐琅彩鉴定与研究工具书。

### 结构为骨:学术纵深与实用索引的完美融合

《绮彩珐琅》的骨架由四篇核心研究文章精密构筑,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知识图谱。

### 《瓷胎画珐琅概述与鉴赏》——奠定认知基石

此文如一幅清晰的导航图,系统梳理瓷胎画珐琅的起源、工艺本质与核心审美特征。它清晰地阐述了康熙珐琅彩是“反瓷”也是“涩胎”、珐琅地为主、大花大叶、有花无鸟等特点,为该时期显著特征。雍正珐琅彩国产珐琅料研发成功,器物上多书写五言或七言诗句,大多数是唐诗,少量是《诗经》中的诗句。乾隆珐琅彩吸收西方绘画技法,讲究光点透视与中国绘画艺术相互融合,器物种类繁多,纹饰丰富多彩。开创并盛行“锦上添花”的装饰,在剔划或彩地的锦地空隙之处绘画添加纹饰,有锦地满纹者,有锦地开光者,器物上乾隆皇帝用自己所写的诗词题款,是该时期的典型特征。文章中明确了“珐琅彩”与“粉彩”的关键区别点(如彩料玻璃质感、绘制精细度、烧成温度差异),为后续深入理解扫清概念障碍,是初学者登堂入室的必经之门。

### 《清雍正时期瓷胎画珐琅概述》——聚焦审美巅峰

雍正珐琅彩以其文人意趣、构图清雅、设色柔丽著称,代表了宫廷审美的至高标准。本文对此时期的专题剖析,精准提炼其胎釉特征、器物造型(如瓶、碗、杯)、典型纹饰(如梅花牡丹、墨竹石等)及款识风格(如“雍正年制”四字宋体款的笔锋特点),为识别雍正真品及后世伪品提供了核心参照系。

### 《康熙雍乾时期瓷胎画珐琅与民国仿品对比分析》——锻造辨伪利刃

此章是全书最具实践价值的精华所在。它并非泛泛而谈,而是通过大量高清图解,如彩料呈色、画工笔触、款识书写的并列对比,直观揭示仿品的破绽。

彩料:真品珐琅彩玻璃质感强,呈色沉稳内敛;民国时期仿品彩料或显浮艳(化学料引入),或玻化不足(烧成温度偏差)。

画工:宫廷画师笔触灵动精准,仿品则常显匠气、呆板,线条绵软或生硬。

款识:真品款字结构严谨,笔力遒劲;伪款常露怯弱、犹豫和不遵循字的规律。

### 《民国珐琅彩瓷: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传承与创新》——解读时代密码

深刻阐释了 1925 年故宫开放后,景德镇艺人在“仿古”与“创新”双重驱动下的实践。此章揭示了民国珐琅彩的两大脉络:一是对康熙乾隆经典摹写的“仿制篇”器物,二是融入西洋技法(光影透视)、商业审美(如洪宪年制、居仁本、古月轩、洪宪御制款识的流行)的本土创新器物,比如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期间作珐琅彩 100 多件,民国有詹元广、詹元彬两兄弟绘画水平极高,被称为“全活”,绘画、填色、烧制皆精通,是民国珐琅彩领军人物。

### 器物为肉:61 件标准器的深度图解与实战应用

中国瓷胎画珐琅脱胎于铜胎珐琅器物,绘画材料同样使用由西方引进而来的“珐琅彩料”,由于材料的昂贵,加之皇家对其独特的偏爱,从珐琅彩诞生之日起,便由皇帝主导,下令由西洋画师和传教士在宫廷内创作绘画、烧制,形成一融合中西绘画、材质、艺术审美的新品种,对世界美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甄选的这 60 余件代表性器物,是本书无可替代的核心内容。它们被科学划分为两大板块,并进一步细化为六大主题。

晚清民国仿制康雍乾珐琅彩器物人物篇:聚焦仕女、婴戏、高士等。重点对比人物开脸神态(真品含蓄,伪品程式化)、衣纹线条(真品流畅有弹性,伪品或滞涩或油滑)。

花鸟篇:对比禽鸟羽毛的绘制(真品层次丰富,伪品略显平板)、花卉枝叶的转折(真品自然生动,伪品表现僵硬)。

# 《绮彩珐琅》：一部可执于掌中的珐琅彩鉴定宝典

钱伟鹏 冯天书



花卉篇:突出花卉渲染技法(真品有阴阳向背,伪品则以平涂代替)、构图疏密(真品讲究,伪品或拥挤或松散)。

花蝶山水图案篇:分析山水皴法(真品有笔墨韵味,伪品则显得杂乱)、昆虫虫爪(真品精细入微,伪品常简化)。

### 晚清民国创新品种

此部分器物是本书独特价值所在,展示了民国时期特有的中西合璧风格、世俗题材描绘(描写节日喜庆气氛的如“老翁恭贺辞旧岁,孩童排手过新年”,描写人们休闲娱乐的如“儿童游玩歌乐岁,笙鼓频吹颂宜生”“室女多俊俏,祝儿岁道遥”)及新彩料运用,如第 36 页至 37 页珐琅彩王大凡风格人物纹样,上下边饰十一层之多,有新彩、粉彩、金彩、红彩创新的独特风格。图版图片、文字、款识标注清楚一目了然。

本书图版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体现在:

超高精度图像 提供器物全景、关键部位特写(如口沿、底足、款识、纹饰细节)甚至显微效果(如釉面气泡、彩料剥蚀),如同将器物置于放大镜下观察。

标准化信息摘录 每件器物均标注准确尺寸、款识全文、明确出处(收藏机构或可靠传承),建立权威数据库。

纹饰分类索引 六大图版分类本身就是强大的检索工具。当读者遇到一件珐琅彩器,可迅速根据其主体纹饰(如“绘有牡丹与缙带鸟”)定位到“花鸟篇”查找同类标准器进行比对。

对比图表的直接应用 书中大量康熙雍正真品与晚清民国仿品、民国不同时期创新品种的并列图版及文字标注,本身就是一套现成的对比对卡,可用于市场鉴定。

### 经验为魂:从书读到市场的桥梁

作为长期活跃于收藏一线的从业者和推广者,通过以下两件实例,可深切体会到《绮彩珐琅》在实战中的分量。

### 破解“雍正”珐琅彩确之谜

笔者曾见一件署“雍正年制”款的珐琅彩花卉瓷碗,画工精妙,几可乱真。然依据书中“款识对比分析”要点细察发现:其“雍”字结构松散,神韵不足,特别是“乡”字写得规整,笔力软弱,没有“雍正”本朝款识的端庄稳健、舒展自然的气韵。再对比“花朵与叶片”章节中对两个时期的观察分析可知:雍正时期器物娇嫩的花朵与老辣的叶片颜色形成鲜明对比,并且花朵有一种肿胀质感,叶片用两种绿色表现出正反、姿态各不相同,虽用墨线勾边,但并不突兀;晚清民国时期仿烧器物,对于颜色的把控欠佳,花瓣颜色有一定的过渡,但细观可发现颜色有一丝凌乱之感,叶片虽用两种绿色进行描绘,但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叶片正反,更像是新老叶片的对比,并且与勾边墨线融合得不理想。书本知识瞬间转化为真伪判断的利器。

### 确认民国创新品种价值

某次征集到一件绘有时装西洋女的珐琅彩花瓶,风格独特。通过翻阅书中创新的“人物篇”,找到数件构图、设色、人物比例及西洋光影技法运用高度相似的器物,尤其底款“古月轩”风格一致,据此迅速锁定其为民国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创新精品,明确了其收藏定位。

本书不仅是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践行“让文物活起来”的成果,更是为晚清民国珐琅彩瓷这一特殊而重要的艺术篇章,树立了一套清晰、可靠、可操作的认知与鉴定体系。这部书完美平衡了学术深度、实用功能与普及使命;五篇研究文章基于扎实的文物研究,观点清晰,论据充分;60 余件高清图解器物图版及详细标注,可随时查阅的视觉“词典”和“标尺”;语言平实晓畅,图文紧密结合,将专业艰深的珐琅彩知识转化为收藏者、爱好者皆可掌握的方法论。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御窑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

### 《绮彩珐琅:珐琅彩瓷研究专辑》

编者: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8 月

# 齐鲁文脉的新诠释与学术突围

## ——评《齐鲁文物》2025 年第一辑

孙敬明

由山东博物馆主办的《齐鲁文物》自 2012 年创刊以来,历经 12 辑的沉淀与凝练,已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辑刊。2025 年第一辑的全新亮相,以“形式突破+内容深耕”的双重优势,呈现了一场关于山东文物研究的学术盛宴。从杂志化的版面设计到聚焦地域特色的内容架构,从“石观万象”专题的深度剖析到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呈现,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刊物对学术质量的坚守与对文化传播的创新。

### 形式革新:让学术刊物兼具美感与可读性

传统学术刊物常因版面设计单调、视觉呈现枯燥,难以吸引更多广泛的读者群体。而《齐鲁文物》2025 年第一辑打破这一局限,以“杂志化设计”为核心,实现了学术性与观赏性的融合。封面设计巧妙融入齐鲁文化元素,选用象征历史厚重感的赭石色为主色调,费县刘家崖汉墓前室北壁上段画像线条飘逸流畅,勾勒出孔子见老子“执礼受简”的简约轮廓,在现代设计美学中传递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

更值得关注的是折页设计的创新运用。在“石观万象”专题中,折页以跨页大图形式清晰呈现了微山岛类型墓室仙境生活、车马出行图和昌乐类型石椁画像等,高清扫描技术让画像的每一处细节都纤毫毕现。这种设计不仅解决了传统学术论文中插图尺寸受限、细节模糊的问题,更通过视觉冲击力让抽象的文物研究变得具象可感,实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传播理念。

### 专题深耕:“石观万象”解锁汉代石刻研究新维度

作为本辑的核心亮点,“石观万象”专题以五篇特约稿件为支撑,聚焦山东汉代石刻,从图像解读、文化溯源、地域特征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探索,展现了山东石刻研究的前沿水准与独特视角。

杨爱国的《看图与读书——再议汉代画像的左右》堪称专题的“破题之作”。长期以来,学界对汉代画像左右方位的解读多以观者视角为基准,导致部分图像内涵的误读。而该文以济南市长清区大街村东汉墓门楣画像石“左青龙右白虎”的榜题是关键证据,提出“汉代画像石的左右应以建筑方向为准,而非观者一方”的核心观点。这一论断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认知偏差,更为后续汉代画像解读提供了全新方法论。

罗二虎与侯存龙合著的《汉代石椁画像的地域性——基于“仙境与升仙”题材视角》,则通过对不同区域汉代石椁画像的系统对比,揭示了山东地区石椁画像的独特地域特征。文章将“仙境与升仙”题材的石椁画像划分为微山岛、庄里西、昌乐、济宁师专四种类型,并详

细分析了各类型的图像组合、题材特点与形成年代。这种细致的类型学分析,不仅清晰呈现了汉代石椁画像的地域差异,更揭示了不同区域文化观念的交流与融合。

姜生的《山东汉画像石与道教文化起源》则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宗教史领域,提出了“汉代画像石为早期道教文化研究提供实物佐证”的观点。文章通过对比马王堆汉墓棺槨结构、帛画与嘉祥武梁祠画像,结合早期道教文献记载,指出东汉墓葬中的画像、结构实则是“太阳炼形”之“宫”的符号系统,承载着“先死后脱”“尸解成仙”的生命转换信仰。例如,武梁祠画像中庖厨、仙药、老子持仙杖等图像,与早期道教文献中仙术记载高度吻合,证明了“天师道”创立之前,山东地区已存在丰富的神仙信仰体系。

段羿仲等人的《临沂张官庄汉代画像石墓中的“九头人面兽”形象研究》,则以具体文物为切入点,展现了微观研究的学术价值。文章结合考古发掘、文献考证与图像学分析,围绕“九头人面兽”的形象展开探讨,逐一分析其为“人皇”“开明兽”的可能性,最终揭示该形象在汉代贵族墓葬中所承载的政治权威与神话象征意义。

### 多域协同:展现山东文物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除“石观万象”专题外,本辑的考古、文物、博物馆、文化遗产、新论等板块同样亮点纷呈,12 篇论文涵盖考古调查、文物探研、展览创新、文物保护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山东文物研究的多元维度与丰硕成果。

考古板块中,张冲等人的《山东淄博巩义窑窑址调查》为研究山东宋金时期制瓷业提供了关键资料。文章介绍了 2018 年淄博市博物馆对巩义窑窑址的调查结果,通过对采集标本的类型学分析,指出该窑址以白釉瓷器为主,黑釉次之,且与磁村窑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文章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窑址兴衰的原因——北宋中晚期社会稳定、市场需求增大推动窑址发展,而金代烧瓷燃料由柴转煤则导致其衰退。这一研究为探讨山东宋金时期窑址研究和古代手工业发展与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的关系提供了典型案例。

文物板块则聚焦馆藏文物的深度解读,王晓雁与魏风铃的《抱节虚心 岁寒不凋——潍坊市博物馆藏竹石图赏赞》便是其中的代表。文章以潍坊市博物馆藏明清画竹高手冯起震、招子庸、谭谟伟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画作笔墨风格、题材选择、题跋内容的细致分析,展现了不同画家对“竹文化”的诠释,为研究明清文人画的地域特色提供了新视角。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板块则关注“文物活起来”的实践路径,孙艳丽的《革命主题类展览跨界叙事结构探索——以“铭记历史——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